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 宋希濂 (1)

罗广文在四川编练新军和率领

第十五兵团起义经过 赵秀崑等 (56)

第十六兵团在川西起义前后 傅英道 (78)

我在成都外围起义经过 鲁崇义 (88)

雅安起义经过 楊学端 (93)

李文第五兵团在川西投降紀略 王应尊 (99)

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复灭实录 李犹龙遗稿 (105)

西南解放前夕美国参議員諾兰到重庆

見蔣介石的内幕 宋希濂 (157)

重庆、成都解放前夕蔣介石指使的

大破坏与大屠杀 郭 旭 (159)

国民党处理聞一多被刺案凶犯内幕 王凌云 (174)

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经过 沈 醉 (177)

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 楊肇驤 (187)

美蔣在南京受降前后与日寇的勾結 廖耀湘 (224)

我所知道的美国“盟軍”与陆軍总部 张文杰 (231)

蒋介石利用陈纳德航空队参加内战片断……	程藩斌 (241)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真相 ……………	陈贻雅 (246)
重庆三千万元物资走私案见闻 ……………	吕恢祺 (253)
我所知道的顾祝同 ……………	方 曦 (255)

附注

对《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二一六页

对《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一九八页

对《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二一六页

蒋介石利用陈纳德航空队参加内战片断……	程藩斌 (241)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真相 ……………	陈贻雅 (246)
重庆三千万元物资走私案见闻 ……………	吕恢祺 (253)
我所知道的顾祝同 ……………	方 曦 (255)

附注

对《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二一六页

对《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一九八页

对《解放前夕的滇局风云》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五辑二一六页

我在西南的掙扎和被歼灭經過

宋 希 濂

一 蔣介石在重庆的一些动态

1949年7、8月間，鄂西的宜昌、沙市及湖南的长沙、常德等地相继解放，白崇禧率桂系部队退据衡阳、邵阳一带。西安、宝鸡等地，亦于6、7月間解放，胡宗南率部退据秦岭及其以南地区。这时的西南，除川、康、滇、黔四省外，还应包括陝南及鄂西、湘西的一部分。在这个地区內，残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地方保安团队在內，共計約九十万人。軍事指揮的首腦部为西南軍政长官公署，設在重庆，长官为张群。下轄川陝甘边区綏靖公署，設在汉中，主任为胡宗南；川鄂边区綏靖公署，設在万县，主任为孙震；川湘鄂边区綏靖公署，設在恩施，主任为宋希濂；貴州綏靖公署，設在貴阳，主任为谷正伦；云南綏靖公署，設在昆明，主任为卢汉；西昌警备司令部，設在西昌，司令为賀国光；此外还有直属的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等单位。关于各綏署所轄兵力及分布情况，我所写的《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見《文史資料选輯》第二十三輯）已有較詳細的叙述，不再重复。这些部队除两三个軍（例如第一軍、第二軍）装备較好，兵員較足，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以外，其余都是于1948年下半年和1949年上半年被人民解放軍打垮了的残部以及一些新兵和地方团队拼凑編成的，没有什么战斗力。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于8月24日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蒋家王朝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紹武、馮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25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蒋介石到重庆后，即电召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员到重庆来见他，并于8月29日（或30日）上午9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蒋介石、张群外，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伦、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蒋经国、

俞济时、邱渊(西南区补給司令)、程开椿(胡宗南部的补給司令)、刘宗宽(长官公署副参謀长兼第三处处长)、徐远举(第二处处长)、孙伯先(第三处副处长)、沈策(胡宗南的副参謀长)等人。首由徐远举报告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的进展情况,同时强调西南地区的安定。继由孙伯先就西南长官公署所辖各部队布防情况和一些在后方整补的部队的情形,作了概要的说明。第三个发言的是胡宗南的副参謀长沈策,他十分浮夸地说胡宗南部守备秦岭地区有充分把握,并說必要时可向关中进击,收复西安;同时提出了胡部策应兰州出击隴南的军事计划。最后由蒋介石讲话,一开头他想安定大家的心理,說“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沒有說出具体内容,只說:“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就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談話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說,“有陆海空軍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我們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軍,有相当强大的海空軍,絕沒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爭取胜利。”蒋介石讲话后,到11时30分会就散了,总共不到三个小时,既无議案,也无討論。其实,在当时日暮穷途的局面下,这种会议,不能不只是形式的,也可以說是多余的。

蒋介石多年来对于部下,一贯是制造矛盾和运用矛盾,实行双线以至多线政策进行控馭。除了他自己的势力所不能控制的地区外,凡他所委派的方面負責人,軍队自师长以上,行政自厅长以上,他总是要实行他的这一套政策,以防止某些人形成一种实力,尾大不掉,危及他的統治。这种实际的事例是很多的,他对于张群这样

一个将近四十年的密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也并不例外。张群这次来到四川后，因为所有在西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均与他毫无渊源，所以他很希望能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甘于做一个空头的西南军政长官。我于8月9日到渝见他时，他就曾对我表示说：“蒋先生调王方舟（王陵基号方舟）回四川来当主席，一年多了，王方舟个性倔强，态度生硬，四川人多称之为‘王灵官’，他和各方面都搞得不好，你和宗南的部队的补给，主要靠四川，王方舟能不能担起这个任务来满足前方的需要，我很担心。”由此可以看出张群早有撤换王陵基、由他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之意。蒋介石到渝后，刘文辉、邓锡侯和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等人正式向蒋要求撤换王陵基，并拥护张群主川，但被蒋介石坚决拒绝。同时，我还听说张群曾向蒋介石建议调换重庆市长杨森，并提出以曾扩情继任，但也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坚决维护王陵基、杨森呢？显然是想利用这些派系之间的矛盾来控制张群，控制四川各派系的军阀。

8月28日（或29日）下午，罗广文（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邀约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刘伯龙、郭汝瑰、陈春霖、向敏思、沈策、赵秀昆等十余人，到他的重庆办事处座谈并叙餐。大家交换了一些关于时局的意见，胡宗南主张由大家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获得一致的赞同，当即推郭汝瑰、赵秀昆（赵为罗广文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两人起草信稿，经过讨论修改补充后就通过了。这封信约有七八百字，原文我记不得，只记得大意分为三段。第一段说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与“中央”保卫华南、西南及台湾等地区的决策；第二段特别强调西南地区的有利地势，人力物力的丰富，巩固并充分利用这个地区的优越条件，使之成为反共

复兴的基地；第三段請求蔣介石留駐重慶或成都就近指導軍事政治黨務，使西南地區全體軍民團結一致，奮鬥圖強，“國家前途，實深利賴”，等語。信繕正後，大家簽了名，推胡宗南、宋希濂、羅廣文、何紹周、劉伯龍五人於第二天下午4時前往山洞陵園見蔣當面遞交。

蔣介石看完了這封信，首先對我們發了一大套議論，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幾百萬黨員特別是許多負責幹部之“不能努力實行三民主義”，接着便說：“我現在台灣創辦了一所革命實踐學院，調訓負責幹部，由我親自主持指導，如果局勢穩定，將來大家也可輪流前往受訓。這個學院能不能办好，關係本黨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經常住在台灣，而不能長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協力，能撐持一個時期，國際形勢就一定會有變化，到那時，我們就可和台灣方面的力量配合起來進行反攻，以爭取最後勝利。”蔣說完後，我們幾個人也相繼說了一些意見，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說明請蔣留住四川的重要性。最後，蔣介石只表示說：“以後我可常來四川，希望你們把我的意思轉達給各軍師團長。”約一個多鐘頭的會談，就這樣結束了。

下面我想談談我和蔣介石幾次談話的情況。

我於8月25日上午9時半由恩施乘飛機到了重慶，11時即到山洞陵園去見蔣介石。蔣在他所住的一棟小平屋的走廊上接見了我。我向他報告我所指揮的部隊自宜昌、沙市撤退後的情況並說明目前的主要問題是軍隊糧食補給困難，致使前線部隊常處於半飢餓狀態，影響士氣。蔣囑我找錢大鈞商討解決辦法，隨即問我：“程潛、陳明仁在長沙叛變，你事先知道否？”我答：“不知道。”又補充說：“當事情發生後，我立即查問電台和陳明仁兵團的電台是否

尚可連絡，电台答复說还可以，我就即刻发致陈明仁一电探詢真相。第二天得陈明仁复电，申述他脱离中央，投向共軍的原因，并希望我和他們采取一致行动，我复电拒絕。以后就再沒有联络过了。”蔣連声說：“好！好！”談到这里，谷正纲进来了，蔣介石因为有事，叫我再約時間面談。

8月26日下午，蔣介石又把我叫去談話。他要我把我所指揮的几个軍的軍长师长姓名、籍貫、軍校期別及他們对共产党的态度，向他汇报。我逐一地作了答复，并把他們每个人的性格和指揮能力，也概要地加以說明。蔣介石听了，臉孔上显露着相当滿意的表情。接着他說：“我們和共党是势不两立，共产党得势，我們这些人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要告訴各級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要人人抱定为我們总理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蔣介石这番話，充分透露出他在临近末日之际那种垂死掙扎的絕望心情。

蔣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將領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內容的會議和个别接見詢問情况外，並沒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就曾对我說：“这次总裁来，我們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結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嗎？”会也开过了，見也見过了，錢大鈞通知大家說：“奉总裁指示，各將領沒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9月2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見蔣介石辞別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話。老实說，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蔣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話真有听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軍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蔣介石及国防部断絕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緬边区去的行动，后面我将詳細叙述。

二 异想天开的所謂“反攻”

我于9月2日下午飞回恩施后，9月中旬某日（确切的日期我記不清楚了），顾祝同偕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許朗軒、第二厅副厅长某（忘其姓名）及后勤方面的人员等飞到恩施举行了一次軍事會議，参加者除顾祝同及同来的几个国防部高級人員外，有我和第十四兵团司令鍾彬及本部參謀长、副參謀长，第二、第三、第四处处长，补給司令等。首由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就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报告国民党軍及解放軍的位置（国防部第二厅对于解放軍的行动，并无正确的情报来源，只是根据无线电測向台来判断解放軍各軍的位置）。继由許朗軒发言，說共軍兵力相当分散，是我軍反攻的良好时机，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島屿的湯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隴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綏靖公署所指揮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这是賦与我的反攻任务。最后顾祝同发言，說明这次反攻对政治和軍隊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部队长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計劃。真是活見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呢？所以我在會議上一言未发。我部的一些幕僚人員提出了关于派空軍配合作战及补給等問題，并未获得具体解决办法。會議历时两个多小时結束。

午飯后，我請顾祝同到我的臥室里休息，順便問他广州方面的情形。顾說白崇禧、薛岳等和他搗乱搗得厉害，对于軍隊部署等問題，牵制掣肘，事情很难順手；解放軍主力現在江西，似有越过大庾岭进攻广州的企图，形势殊难乐观，只希望西南方面能多撑持一个

时期。約在午后4点多钟,顾祝同等一行离开恩施飞往重庆去了。

顾祝同走后,我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一带被解放軍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尙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頓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給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研討,决定令飭第十四兵团所属之第十五軍派一个团的兵力向慈利作試探性的攻击,第一二二軍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飭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为陈克非)派出約两个团的兵力,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軍作試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应积极整頓补充,并构筑工事。以后这些担任行动的部队,由于受到解放軍有力的回击,未获得任何成果,而渡过澧水窜扰的小部队,多半被解放軍所消灭了。

至于湯恩伯、胡宗南两部所謂反攻的情况是:福建方面,解放軍已肃清福建大部分地区的蔣軍,迫近在福建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門,湯恩伯本人逃到台湾去了,其残部逃窜到沿海島屿。胡宗南派了一部分队伍偷袭宝鸡,不仅沒有成功,反而被解放軍乘机突破了秦岭防线,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門戶,迫使胡宗南的部队不断向川北地区龟縮。

据顾祝同告訴我,这次反攻方案,是白崇禧提出来的,而且他主张最力。当时白崇禧退据在湘南的衡阳、宝庆一带,拥有第七軍、第四十八軍、第四十六軍、第五十六軍、第一二六軍共五个軍的桂系部队,其中第七軍是桂系軍閥北伐时期的老底子,第四十八軍則为1932年編成,曾由白崇禧亲任軍长。这两个軍的軍官百分之九十是广西人,兵員亦以广西人为多,战斗力較强,白崇禧并利用封建关系維持其絕对的統治,是桂系軍閥部队的两张王牌。除上述五个軍外,还有黄杰的第一兵团所属的第十四軍及七十一軍。 8

月間解放軍四野部隊曾有一小部進抵湘鄉縣屬之永豐鎮附近，已漸接近寶慶。白崇禧調集數倍的兵力，向這部分解放軍攻擊，解放軍自動撤退。白乃大肆宣傳，說什麼“永豐大捷”，極力夸耀桂系軍閥部隊的戰鬥能力，認為共產黨的軍隊打不過他的廣西部隊，因此在那樣微妙的形勢下，大唱其反攻的論調。但是這位自命不凡、專好玩弄權術的軍閥，他的所謂反攻尚未有具體行動之前，解放軍就以神速勇猛的行動，向盤踞在衡（衡陽）寶（寶慶）地區的桂系部隊進行掃蕩，在數百里的疾追中，經四晝夜的激戰，將桂系的所謂王牌部隊——第七軍和第四十八軍的主力，聚斃於衡陽西南的山區。白崇禧經此沉重打擊，吓得驚魂落魄，自己乘飛機逃到海南島，叫第三兵團司令官張淦率桂系部隊及黃杰所部第一兵團、劉嘉樹所部的十七兵團和余漢謀部的殘余部隊，東出粵桂邊境，企圖打通雷州半島的出路，以實現他的所謂“確保左右江，屏蔽昆明，支援海南，以爭取外援”的方案。但在解放軍的英勇堵擊和風馳電掣、連續不停的猛追下，所有桂系部隊及黃杰、劉嘉樹等部，一舉被聚斃於粵桂邊區的國境線上，除黃杰兵團的殘部六七千人竄入越南，劉嘉樹兵團約五千人逃往雲南外，几无一漏網。

當時殘存在西南的蔣軍，大多殘破不堪，或者由一些地方團隊和新兵臨時編成，加上一些地方軍閥的部隊，都談不上有什麼戰鬥力，而且散布在北起秦嶺、南至昆明的廣闊地區里，是不可能在任何地點打一次像樣子的仗的。人民解放軍無論向那一點進攻，都可迅速擊破，是毫無問題的；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國民黨軍隊到西藏或國外去。當時蔣軍胡宗南部三十多萬人駐在陝南、川北一帶，孫震、宋希濂兩部共約二十萬人駐在鄂西、川東一帶，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是以保衛四川為核心的。人民解放軍在毛主

席的英明领导下，首先以二野的楊勇兵团击破蔣軍在湘西芷江地区的微弱抵抗后，迅即进入貴州，于11月中旬解放貴州省会貴阳，除一部扫蕩貴州境内残敌外，主力西出毕节进入川南，相继解放泸州、宜宾、乐山、自貢等地，并进出于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一带，截断蔣軍入西康逃路。与此同时，又以二野的陈賡兵团自广西沿着桂越、滇越边境进军，直抵滇緬边境的芒市、龙陵、騰冲等地，形成更大的一层包围圈。由賀龙元帅指揮的周士第兵团，由刘伯承元帅指揮的二野的陈錫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也同时分别在陝南、川东击破胡宗南、宋希濂、孙震等部。在川境内的蔣軍，最后蜷集于成都盆地，被解放軍层层包围，全部歼灭。有少数残余逃到西昌、滇西一带，最后亦被彻底消灭得干干净净。

三 荊門战役前我的部署和策划

1. 指揮机构名称、地点的演变

1948年8月，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9月中旬我到沙市成立第十四兵团司令部，10月間將兵团司令部推进至荊門。到11月初，因淮海战役的序幕战揭开，蔣介石將我所指揮的二十軍、二十八軍东調，情势急变，我的兵团司令部于11月底又开回沙市。1949年2月解放軍攻占荊門，有一部数千人有自当阳进攻宜昌的模样，原駐宜昌的川鄂边区綏靖公署主任孙震惊惶失措，立即率其公署人員乘船撤往巴东及三斗坪等地。我聞此消息，即命第二軍及第十五軍分两路自沙市西北地区向当阳前进，我自己亦乘軍舰到了宜昌。局势稳定后，我派員到三斗坪請孙震回来，但孙不肯来，并乘船上駛，撤往万县。国防部乃于3月間发表我为湘鄂边区綏靖司令官，划湘西鄂西地区归我負

責。于是，我乃将司令部移駐宜昌，并将十四兵团司令官一职交由鍾彬接替，仍归我指揮。《文史資料选輯》第十三輯所載张治中先生《北平和談前的几个片断》一文中說：“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即孙震），自己移駐到宜昌去，便說是奉了他（指蒋介石）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憤慨地告訴蕭毅肃，由蕭传了出来……”。孙震当时离开宜昌的经过事实，确是如此。孙震那时最感苦惱的是，名为綏靖主任，实际上却是一个无兵司令，我的兵团在他的綏靖区内活动，但国防部并未叫我归他指揮，这样，当我到宜昌后，他自然不願回来了。此事是当时的軍事形势造成的，并不是我有意识地要逼走他的，蒋介石也沒有給过我电报。1949年7月中旬解放軍向宜沙进軍，并已在沙市下游渡过长江，我乃下令放弃宜沙，向巴东、五峰、石門、慈利、大庸之线轉移；8月初司令部移到鄂西的恩施。8月中旬，国防部发表我为“川湘鄂边区綏靖公署主任”，直到12月底解放时为止。

2. 指揮部队的演变

1948年9月我在沙市組成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后，国防部及华中“剿总”先后命令拨归我指揮的部队計有：陈克非的第二軍，刘平的第十五軍，楊干才的第二十軍，刘秉哲的第二十八軍，李振的第六十五軍，方靖的第七十九軍，张际泰的湖南保安第一旅。到11月，第二十軍、第二十八軍調往淮海战場，第六十五軍原駐陝西宝鸡一带，由于胡宗南坚持不放，始終沒有过来。这样，就只剩下三个軍及一个旅了，而第十五軍全系由南阳地方团队組成的，装备和訓練都很差。我为了扩张势力，于1948年12月至1949年9月間，先后向国防部建議編組了两个軍（每軍两师，共四个师），即：以原湖南省

保安第一旅改編为一个师，番号為二九八师，仍以张际泰任师长；以鄂西师管区的两个新兵团为基干扩編成为一个师，番号為五十四师，派董惠任师长；以上两个师編为一个軍，由原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陈希平担任軍长，番号為一一八軍，駐恩施、建始一带。

1948年11月国防部授权給我成立一个师，番号為二一七师，派謝淑周任师长，在湖南省軍管区接收一批新兵并自行募集一些編成；原駐南阳第十三綏靖区司令王凌云自南阳南撤时，带来南阳附近地方武装褚怀理等三个纵队共八九千人，紀律极坏，在松滋一带奸淫擄掠，无所不为。我派部队将这三个纵队解散，調換大批干部，改編为一个师，番号為三四五师，派黃鼎勛为师长。有了这两个师后，我又向国防部建議編为一个軍，番号為一二二軍，由张紹勛担任軍长，駐在湖南的石門、慈利一带整訓。原駐在宜昌的六十师，本是归川鄂边区綏署孙震指揮的，但該师师长易瑾是我多年的部属，所以和我常有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师，番号為二二三师，师长为陈瑞鼎，駐在秭归以北一带担任警戒。白崇禧那时和我的矛盾日益尖銳，他想抓住这两个师来牵制我，乃向国防部建議将这两个师編成一个軍，并保荐他总部的副參謀长赵援为軍长，番号為一二四軍。3月間我到宜昌后，国防部命令这个軍归我指揮。至此，归我指揮的部队，就有第二、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一八、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共六个軍的番号了。鍾彬原在广州任第四編练司令，国防部发表他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后，他于4月間来到宜昌，我将十五軍、七十九軍、一二二軍編为第十四兵团，并指定該兵团司令部駐在宜都。及到8月間部队自宜沙一带轉移到巴东、野三关、五峰、石門、大庸之线后，9月初我又得国防部同意，将第二軍和一二四軍組成为一个兵团，以第二軍軍长陈克非兼任兵团司令官，番号為第二十兵团。另外我

又于1949年4、5月間大力收編湘西地方武力。此种地方武力大都掌握在地主豪紳手中，平日作威作福，欺压人民。这些恶霸势力知道共产党一来，将无他們存在的余地，因此深感危惧，紛紛派人或亲自来到宜昌和我接洽，要求給予名义，并酌量补充弹药，主食由地方筹給，副食請中央补助。我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也沒有什么战斗力，但我想利用这些力量，使他們在解放軍向我进攻时能起一些扰乱和牵制的作用。于是我答应收編，条件只有一个：凡受收編的，必須开到我所指定的地点集合，经我派人点验人数武器后，才能发給副食費，并酌量补充弹药。大体商定后，经我先后收編的，計有：田載龙的新編第一师，周燮卿的新編第二师，陈子賢的新編第三师，罗文才的新編第四师，汪援华的新編第五师，陈策勋的新編独立第一旅。其后又給辰谿张玉琳匪部以暫編第二軍的名义。并于6月初召集他們及湘西的一部分县长到常德开会，会商他們的駐地、补給及整編等問題，我在会上号召他們一致团結起来对付共軍的进攻，不要再自相残杀，否則将同归于尽。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要积极扩編部队，扩张势力呢？除了认为要对付解放軍的进攻，必須有力量这个主导思想外，还有一种思想也占相当重要地位，所以我想附帶談談。自北伐至抗日战争初期，以黄埔軍校学生为骨干的蔣介石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調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說，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調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蔣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权过大，会对他不忠誠，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最忠誠可靠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誠和胡宗南，其次是湯恩伯。不到